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Today (Excerpt I)

By Alexander Fyfe

Translated by LENG Xueyuan

Received: July 7, 2023

Accepted: July 20,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Alexander Fyfe, trans. LENG Xueyuan. (2023).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Today (Excerpt 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110–116,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3](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3>

Abstract: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New Interventions,’ argues for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Marxist approaches within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place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today, a brief history of important Marxist interventions is provided,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paid to works by Omafume F. Onoge, Biodun Jeyifo, George M. Gugelberger, and Chidi Amut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nine essays (and one afterword) contained in this issue are introduced.

Keywords: Marxism; African literature; Materialism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frican Identities*, Volume 18, Issues 1–2, 2020.

Notes on the author: Alexander Fyf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His work has appeared in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LENG Xueyuan is an MTI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children’s literary translation. Her email is 1245320992@qq.com.

馬克思主義與當今非洲文學研究

(節選一)

亞歷山大·費夫/文 冷雪緣/譯

摘要:本期特刊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新干預」,該書論證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與非洲文學研究中一直存在關聯。在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在該領域的地位之後,本文簡述了馬克思主義介入該領域的學術史。其中特別關注歐瑪福姆·弗賴迪·奧貢戈(Omafume F. Onoge)、拜爾頓·傑依夫(Biodun Jeyifo)、喬治·古格爾伯格(George M. Gugelberger)和希迪·阿穆塔(Chidi Amuta)的作品。基於上述作家作品,本文推介了本期九篇文章(以及一篇後記)。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非洲文學;唯物主義

來源:原文原載於《發展中地區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Developing Regions*)2018年第33卷第1期,譯文有調整。

作者簡介:亞歷山大·費夫是貝魯特美國大學的英語助理教授。他目前的研究重點是現代非洲文學與主體政治之間的關係。他在《干預:國際後殖民研究雜誌》、《國際英語文學評論》(ARIEL)、《非洲文學研究》和《劍橋後殖民文學研究雜誌》上發表文章數篇。

譯者簡介:冷雪緣,吉首大學MTI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兒童翻譯,郵箱是1245320992@qq.com。

現在需要一種嚴謹的唯物主義文學解釋,以便從形而上學的迷霧和抽象的經驗細節中恢復「真正的」意義,而這些迷霧和細節在索因卡(Soyinka)主要戲劇作品的注釋中層出不窮。(傑依夫,1984:1)

馬克思主義遠不止對藝術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分析進行了批評,也對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體制過程進行了考慮。馬克思主義批評家關注的是為藝術生產和批評結構的民主化而鬥爭。(奧貢戈,1985:60)

非洲文學及其批評證明了如何界定非洲狀況的歷史矛盾。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使之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文學批評必須以文化理論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理論觀點為前提。在這方面,文學理論和實踐必須構成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一部分,從而去除文學批評的神秘感,將其重新納入社會經驗和實踐,而文學本身就是社會經驗和實踐的一部分。(阿穆塔,1989/2017:7)

這三段話都說明了馬克思主義方法對非洲文學的影響和吸引力。傑依夫在很多關於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戲劇的研究中都有所發現,將其作為對「藝術和文學表達的微妙具體化」的糾正。因此他呼籲進行一種能超越文本中經常相互矛盾的意識形態層次,並將其作為一種有實質根據的話語增加在文中來識別其真實性。正如他明確指出的,這絕對不是一種經驗主義的閱讀方式,而是更確切地說,是一種闡釋學的閱讀模式。可能會激發不同層次的意識形態的精確價值,但也有可能會導致讀者誤入歧途。在奧貢戈的引文中,這種辯證的閱讀模式影響延申至非洲文學創作與構建學術界對其參與的制度力量。奧貢戈提醒我們,這種批評的重點不僅僅是創造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而且還要修改並使這種閱讀發生的結構更加公平。阿穆塔在第三段話稱,摻雜政治的批評不能把自己放在傳說中的「象牙塔」裏,而必須與它所研究的文學作

品處在同一社會和實踐層面。這意味著,它不僅是對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評論,而且本身就是這場鬥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三種說法都摘自馬克思主義關於非洲文學的重要著作,來自一個時期(大約從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後期),當時發表了許多有影響力的涉及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至少在那個歷史時刻——以對非殖民化的批判性重新評價和非洲新殖民主義剝削的物質延續為標誌——在每一個序言中都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分析和非洲文學研究之間的重要聯繫。馬克思主義的閱讀方式,以其通過文學政治與之產生的物質環境辯證關係進行思考的能力,特別適合於理解各類非洲作家對新殖民主義權力結構的意識形態立場。這種辯證法也保證了一種不可或缺的自我反思性:研究非洲文學文本的政治,也就是對這種文學研究的意識形態和物質基礎進行質疑,並可能對其進行重塑。以這些觀點為線索,本期特刊旨在探索馬克思主義對非洲文學的批判方法與當前非洲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相關方式。

在探討馬克思主義在當今非洲文學批評中的地位時,有必要指出,從最廣泛的角度來說,唯物主義的觀點是該領域的一個主要特徵。即使粗略地檢查一下最近幾期的《非洲文化研究雜誌》、《非洲文學協會雜誌》和《非洲文學研究》,也會發現諸如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世界體系等關鍵詞的流行,所有這些都表明,學者們試圖將非洲文學創作置於其發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中。雖然我們可以把這部分歸因於「世界文學」理論的影響,強調文學文本的創作和傳播的重要性,但似乎也有可能是最近非洲僑民文學的繁榮促使更多的學者採用調查模式,關注文學作品在當地和全球文化和資本迴圈中的複雜交織。

儘管如今諸多學者進行批判性閱讀的術語讓人想起馬克思主義那一套話語,並且他們可能對「全球資本主義」及其同義詞採取了高度批判的姿態,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方法往往沒有深入此類研究。以最近出版的《非洲文學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African Literature*)為例,它「旨在作為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一些較新批評方法的非洲文學文本研究的集合」(Adejumobi & Coetzee, 2019:1)。安娜萊娜·托伊瓦寧(AnnaLeena Toivanen, 2019)在題為「非洲流散小說中的全球化、流動性和勞動」一文中,研究了三部當代流散小說中有償勞動和個人流動性之間的聯繫。儘管文章採用了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一篇文章中對勞動的定義,「(勞動)激發了剝削和控制的模式以及剝削可能產生的政治意識的概念」(第 48 頁),對這一術語的解釋沒有承認勞動作為資本價值生產的特殊性。在閱讀這篇文章時,我們可以輕易想到,馬克思主義下的勞動概念更為明晰或可幫助托伊瓦寧進一步分析:例如,將「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類別展開,可能有助於這篇文章更具體地描述它所選的三部小說所描述的勞動是如何與全球資本積累、特定的資本流動以及特定類型的流動相關的。這種對勞動作為一種價值生產活動的關注,也可以對這些文本中流動和勞動之間聯繫的確切政治意義進行更有力的評估,這種評估與該文目前聲稱的小說「將流動和勞動問題從傳統上被認為是政治的領域中分離出來」的說法有所不同(第 57 頁)。^④這並不是要對托伊瓦寧的文章進行全面的批判,而是要說明在非洲文學研究中對深刻的唯物主義問題的分析是如何與曾經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傳統脫鉤的。如果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主要貢獻理解為對資本主義的歷史特殊性、其日益增長的「全球範圍」及其剝削機制的無與倫比的敏感性。那麼,至少由於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大量作品缺乏接觸,就導致了我們批評慣用語地極大貧乏。

這一切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對非洲文學的批評已經「過時」了。事實上,在這個領域有許多批評家認為,它仍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和政治試金石,通常言簡意賅。重點是要指出,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政治經濟

學與非洲文學研究之間的密切關係,在本引言的序言中得到了證實,但這種關係不再那麼自然地呈現出來。當然,這可以部分歸因於馬克思主義鬥爭和社會主義在非洲大陸的衰落;在 20 世紀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朱利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誇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或湯瑪斯·桑卡拉(Thomas Sankara)等人物為非洲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實際的例子,而如今這樣的具體實例卻少之又少。但伊瓦嫩的文章也是一個例子,說明馬克思主義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被該領域吸收和邊緣化的;其更廣泛的關注是存在的,但理論基礎往往缺乏。奧萊里昂(Olaniyan)(2016)描述了這一趨勢,他在一個註腳中承認傑依夫、恩古吉·瓦·西翁戈(Ngũgĩ)和奧貢戈的「意識形態」批評在非洲文學研究史上的重要性,他寫道,在不理解其馬克思主義前輩的情況下,這種批評模式可以延續到今天:「如今無論是一般的還是具體的非洲文學研究,意識形態意識或批評的運用的有效性並不取決於對馬克思主義批評中概念微妙之處的瞭解」(第 395 頁,第 15 頁)。雖然情況可能是這樣,但我想回應的是,僅僅因為不理解馬克思主義譜系的情況下,就開始意識形態批判,這並不意味著它應該這樣做。瞭解以意識形態為手段研究非洲文學的理論以及制度史定是如今進行此類文學批評的一大要素,哪怕只是避免以往可能會發生的任何錯誤。^⑥為了緩和和有時有問題的將馬克思主義吸收到一個更普遍的唯物主義中,本特刊旨在證明馬克思主義分析與當代非洲寫作提出的許多問題的相關性,並思考馬克思主義長期且多面切入非洲文學研究的學術史如何影響當下的文學批評氛圍。

在討論本期的個別文章之前,有必要提及馬克思主義非洲文學研究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和事件。這一領域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批評者之一是格蘭特·卡門朱(Grant Kamenju),他的馬克思主義-法農主義方法影響了利茲大學、馬凱雷雷大學和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眾多同事和學生,其中不乏恩古吉(2018:213)。儘管正如恩古吉(2018)在對卡門朱的職業生涯進行簡要評價時所說,這位批評家沒有廣泛發表文章,但他對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第 213 頁)。事實上,恩古吉謳歌他是「文學革命的無名英雄,是文學與生活、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精神解放的鬥爭相關的不懈宣導者」(第 213 頁)。除了恩古吉本人出版了幾本包含對非洲文學文本的唯物主義評價的論文集之外,另一個有影響力的早期聲音是奧貢戈。^⑦在一篇被廣泛引用的文章《現代非洲文學中的意識危機:調查》(1974 年)中,奧貢戈將不同非洲作家群體的政治取向與非洲大陸的殖民和後殖民經歷聯繫起來,進行了歷史性的分析。這包括將後殖民時期的非洲作家歸入「批判現實主義」(Wole Soyinka, Chinua Achebe)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Ngũgĩ, Ousmane Sembène)的範疇。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提倡以批判的方式參與當代現實的文學」(第 400 頁),「只是證明社會危機的狀況」(第 402 頁),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家則通過確定資本主義剝削是這場危機的原因而「提供了一個精確的診斷」(第 402 頁)。這些作家「認為只有通過清算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克服這些問題」(第 403 頁)。奧貢戈用他文章的後半部分來考慮非洲在後殖民時期的物質環境允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寫作進一步發展的程度。這種非洲文學的社會學是奧貢戈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後續文章中闡述的。

正如奧拉昆勒·喬治(Olakanle George)在最近對傑依夫作品的評價中指出的那樣,「傑依夫跨越戲劇、小說和批評理論,特別是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幾乎總是從特殊性開始,以尋找每一種特殊性中的普遍之處」(George 2018:15)。這是一種非凡的能力,它能詳細闡述人與人之間的複雜聯繫,成為他強烈辯證批評的標誌。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概念時,他從不教條主義,而是經常以出人意料的、但極富洞察力的方式運用它們。例如,傑依夫(1990)在他的經典文章《事物的本質:停頓的非殖民化和批評理論》(*The Nature of Things: Arrested Decolonization and Critical Theory*)中,借用了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Marx's The*



German Ideology) 中的具體概念,並結合了阿爾都塞(Althusser)對意識形態功能的洞察,以探索非洲文學學術的基礎假設(第 36 頁;第 46 頁)。

卡門朱、奧貢戈和傑依夫的文章收錄在古格爾伯格所編《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一書中。本期刊標題也依此命名。格爾伯格的文集出版於 1985 年,引發了關於種族和階級在非洲文學中相對重要性的爭論,並包含了對沃爾·索因卡的神話詩學的嚴厲批評。¹⁰將這本文集置於反對非洲文學批評主流中「對西方資產階級文學方法的隱性特權」(vii)的立場上,古格爾伯格在前言中提出了一種看待非洲文學的方法,這種方法優先考慮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或民族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非洲,顯然意味著兩件事:鼓勵和認可那些開始在這一傳統中寫作的人,但同時也警告非洲的特殊性(種族/非洲性)不再是一旦採取了進步國際主義的立場,特權概念就會出現」(x)。這種基於階級的觀點使這本書與該領域的許多主要學者的觀點相左——查理斯·拉爾森(Charles Larson),尤斯塔斯·帕爾默(Eustace Palmer),阿比奧拉·艾雷勒(Abiola Irele)等人,並將其定位於堅決反對欽維祖(Chinweizu et al)和索因卡所採用的傳統主義的非洲文學方法。於是,古格爾伯格將馬克思主義批評解釋為一種激進的唯物主義選擇。

《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收錄的 13 篇文章,主題相對多樣。除了更廣泛的問題方法論和既定的主題,如激進的非洲作家和非洲戲劇。此外涵蓋的主題還包括安哥拉寫作、烏爾霍博人的詩歌和奈及利亞小說家西普裏安·埃克文希(Cyprian Ekwensi)的作品。在理論上,這些文章即便比古格爾伯格引言所示的更為多元,但這仍可證明——除奧貢戈、傑依夫以及其他幾篇文獻中的重要內容外——該領域對馬克思主義中「階級」以及「意識形態」概念的生搬硬套。在某些情況下,文章採取評估某些文學作品在多大程度上表現或不表現出進步政治的形式,並在這樣做時傾向於優先考慮內容問題而不是形式問題。有趣的是,這些文章都沒有與弗雷德里克·詹姆森的作品有實質性聯繫,也沒有提及他 1981 年出版的書《政治無意識:敘事作為一種社會象徵行為》(*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1983),人們可能認為這部作品對於幾篇文章所發展的非洲文學文本的意識形態批評特別有用。我們可以說,這種缺失表明了選集中一些作者採用的某種機械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與詹姆遜更為青睞的辯證文學文本方法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儘管如此,古格爾伯格的書在出版後的幾十年裏被廣泛引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該領域激進批評的知名度。使它成為集體學術著作的區別在於每一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政治承諾感,這一特點使它與埃馬紐埃爾·恩加拉(Emmanuel Ngara)的《非洲小說中的藝術和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對非洲寫作影響的研究》(*Art and Ideology in the African Novel: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Marxism on African Writing*)有所不同,後者也出版於該書也於 1985 年出版。¹¹

在阿穆塔 1989 年出版的《非洲文學理論:對實踐批評的啟示》(*Theory of African Literature: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Criticism*)一書中,辯證法被置於核心位置。就像在他之前的古格爾伯格一樣,阿穆塔的书既反對「對非洲文學的資產階級批評」(第 2 頁),也反對傳統主義的研究方法,後者主要是欽韋祖等人的方法。然而,替代方案並不只是在非洲文本的階級分析中找到,也是在更廣泛的「文學社會學」中,辯證地來說,「為了理解社會文學的本質將文學的背景、內容和形式視為相互聯繫的領域」(第 9 頁)。阿穆塔接著建立了「非洲文學的辯證理論」,其「基石」是「需要將文學歷史化,重新建立文學與它的資訊和維持的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繫,而資產階級批評在其純粹的形式主義表現中不斷混淆了這種聯繫」(第 89 頁)。至關重要的是,在非洲的背景下,這種方法涉及「帝國主義對非洲的攻擊以及新殖民主義現實的挑戰」(第 89 頁)。因此,對

非洲文學的辯證批評是正在進行的解放鬥爭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種值得肯定的行為。阿穆塔的著作仍廣受關注,不僅是該書深入引證了不少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論述,還有對一系列敘事、戲劇和詩歌文本一針見血的解讀,同時也不忘對非洲文學批評領域中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提出諸多見解。

阿穆塔的书可以被看作是馬克思主義干預系列的最後一部重要作品,該系列始於奧貢戈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文章。^⑤20 世紀 80 年代後,馬克思主義方法在非洲文學中的關注度明顯下降,部分原因可以歸結於這一時期的歷史發展。事實上,到 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都處於危機之中,而在非洲,許多「非洲馬克思主義」運動和政府已經失去了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對一些人來說)對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持續可行性和效用產生了疑問。^⑥在文學研究領域,這一時期的後殖民研究得到了鞏固,在隨後的幾年裏,關於非洲文學的討論大多發生在這個領域(至少是在英美學術界)。正如帕裏(Parry)(2004)所表明的,這個新興領域主要是後結構主義的方向,而不是唯物主義的,前幾代的馬克思主義反殖民主義理論家的貢獻基本上被遺忘了(第 74 頁;第 77-79 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對非洲文學的馬克思主義批評仍在繼續。在傑伊夫等學者繼續創作重要作品的同時,也出現了其他實質性的干預,不僅與非洲文學研究產生了共鳴,也與文學研究中的其他知識形態產生了共鳴。這裏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首先,尼爾·拉紮勒斯(Neil Lazarus)的《後殖民時期非洲小說中的抵抗》(*Resistance in Postcolonial African Fiction*)(1990)既描述了後殖民時期非洲抵抗的問題性,也對獨立後時期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阿依·奎·阿瑪(Ayi Kwei Armah)進行了政治評估。拉紮勒斯對後殖民時期非洲國家角色的遠見,以及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關於非殖民化的著作都密切關注階級問題,其優點和局限性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對後殖民研究的兩個核心問題的重要觀點。第二,尼古拉斯·布朗(Nicholas Brown)的《烏托邦的世代:二十世紀文學的政治視野》(*Utopian Generations: The Political Horizon of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2005)使用了「馬克思主義對黑格爾辯證法的修正的正統解釋」(第 4 頁),以便「在資本主義的內部限制下建立二十世紀文學的解釋視野」(第 1 頁),布朗認為,詹姆斯·喬伊絲(James Joyce)的《尤利西斯》(*Ulysses*)和謝赫·哈米杜·凱恩(Cheikh Hamidou Kane)的《模稜兩可的冒險》(*Ambiguous Adventure*)等多元化的現代主義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關注點,那就是對社會關係的徹底反思。因此,在拉紮勒斯和布朗的專著中,較以前而言用馬克思主義研究非洲文學的方法是文學研究中更廣泛運用的一部分。

「世界文學」這一範疇的重新興起,既與後殖民研究並肩,又與後殖民研究對立,使人們對文學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重新產生了興趣。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這見證了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批評流派的發展,另一方面,它也是文學研究與世界體系理論之間令人著迷的碰撞的一部分。世界體系理論通常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勞動聯繫在一起,「實際上是由學術研究中的一些交叉潮流發展而來,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依賴理論和《年鑒》史學」(伊托(Eatough), 2015a, 第 593 頁)。因此,它本身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而是一種試圖從系統角度理解全球資本主義、構建它的不平等現象及其歷史發展的方法。雖然世界體系理論中對經濟問題的關注經常引起人們對其在文學和文化研究中的適用性的質疑,但「世界文學」的復興和人文學科的全球轉向更普遍地看到了將其見解用於文學研究的興趣。正如伊托(2015b)所說,希望超越「國家」文學的限制性範式的學者們在世界體系理論中發現了一種概念語言,能夠根據更加「全球化」或「跨國化」的框架「重塑文學地理」(第 604 頁)。非洲文學研究也不例外,許多批評家將他們的解讀建立在源自世界體系理論的全球資本主義模型上,通常是通過莫雷蒂或卡薩諾瓦等文學理論家,



他們的作品中都參雜了沃勒斯坦世界體系的版本。¹⁸華威研究集體(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 WReC) 2015年出版的《綜合與不平衡發展:邁向世界文學新理論》(*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Theory of World-Literature*)將世界體系理論應用於文學研究,與本文的介紹特別相關。「世界文學」問題被認為是一個重新興起的理論研究範疇,它的目的是「通過追求綜合和不平衡發展理論的文學文化意涵來重新定位這個問題」(第6頁),華威研究集體的融合理解是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和而不公」(第10頁,莫雷蒂的術語)與利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對「強加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量和階級關係傾向的方式」的有影響力的描述不是取代(或不被允許取代),而是與已經存在的力量和關係強制結合(第10-11頁)。這本書對資本主義(半)邊緣文學如何「記錄」不均衡性,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塔伊布·薩利赫(Tayeb Salih)的《向北方遷徙的季節》(*Season of Migration to North*)在這方面尤其有趣。這本書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思考世界體系的不平等與文學美學之間的關係。

這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學術的簡短歷史概述遠非詳盡無遺,但它旨在突出一些關鍵問題,這些問題激發了對非洲文學的激進和唯物主義探究。我已經試圖表明,因為種種的影響馬克思主義批評也在變化和發展,受到許多個體從業者的改編。受這種豐富多樣的傳統的啟發,本期特刊中的文章探討了當今此類方法的價值和可能性。儘管他們都致力於理解文學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但這些文章在與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流派的接觸中高度多樣化,並引用了全球歷史中的許多人物。就他們試圖做出的貢獻而言,他們大致分為兩類: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方法可以解決非洲大陸文學研究中的既定問題(非洲都市主義、超自然現象、科幻小說),另一些人則關注於馬克思主義與特定非洲作家亨利·奧萊·庫萊特(Henry Ole Kulet)、伊費奧馬·奧科耶(Ifeoma Okoye)、阿伊·奎·阿爾馬(Ayi Kwei Armah)之間的關係。

(Editors: Joe ZHANG & Rosie)